

个侧面反映了药物加工的发展状况。

3. 贮藏 药物贮藏之法,唐以前很少提及。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卷一中反复强调“存不忘亡,安不忘危……贮藏药用,以备不虞”之理,并详细指明生药饮片及成药的不同保藏方法。如云:“凡药皆不欲数数晒暴,多见风日,气力即薄歇,宜熟知之。诸药未即用者,候天大晴时,于烈日中暴之,令大干,以新瓦器贮之,泥头密封。须用开取,即急封之,勿令中风湿之气,虽经年亦如新也。其丸散以瓷器贮,蜜蜡封之,勿令泄气,则三十年不坏。诸杏仁及子等药,瓦器贮之,则鼠不能得之也。凡贮药法,皆须去地三四尺,则土湿之气不中也。”这一系列避潮、防鼠等措施,不仅有效地防止了药物霉变损失,更重要的是延长了药物应用时期,保证了疗效。此外,孙思邈还对与药物贮藏中防潮、防霉变等有密切关系的药房建造和设施提出了具体措施(《千金翼方》卷十四)。

4. 栽培 隋唐时期为发展种药业,国家设有药园以培养药园生,在药物栽培方面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唐代王旻的《山居要术》、韩鄂的《四时纂要》等书,分四季节令,按月列举动植物的采收种植等法,已把成熟的农桑畜养经验与药物栽培结合起来。《千金翼方》卷十四造药一节,就节选了农书中枸杞、生地、百合、牛膝等数十种中药的栽培方法,从造地、翻土、作畦、开垄到选种、下种、施肥、灌溉、除草等一整套田间作业,总结了把它们从野生变为家种的培植法,对枸杞尚有插枝和子种两法。唐代种植学的发展,对当时药物生产起了很大作用,也为后世药物栽培学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(二) 药性理论

这一时期本草学在药性理论方面的发展,主要体现在对药物功能和配伍应用有进一步认识和提高。

1. 药物功能分类 药物最终是服务于临床的。探索药物的功能、主治,并找出其共性加以总结和分类,是本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如《千金翼方》承袭《本草经集注》“诸病通用药”的作法,将药物按主治分为65类以“总摄众病”,有利于临床应用,而对药物功能或主治亦可有进一步的认识。《本经》药物的“三品”是功用分类最粗略的形式。随着用药经验和知识的积累,必然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为若干具体的类别。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的“十剂”之说即是药物功能分类的新发展,其内容为“宣可去壅,生姜、橘皮之属;通可去滞,通草、防己之属;补可去弱,人参、羊肉之属;泄可去闭,葶苈、大黄之属;轻可去实,麻黄、葛根之属;重可去怯,磁石、铁粉之属;滑可去着,冬葵子、榆皮之属;涩可去脱,牡蛎、龙骨之属;燥可去湿,桑白皮、赤小豆之属;湿可去枯,白石英、紫石英之属”。这较“三品”分类前进了一步,更能切合临床应用,也为后世药物功能分类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
2. 配伍 唐代医药学家对药物相互配伍及合理应用的重要性十分关注,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。如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·序例》中说:“药有相生相杀,气力有强有弱,君臣相理,佐使相持。若不广通诸经,则不知有好有恶,或医自以意加减,不依方分,使诸草石强弱相欺,入人腹中,不能治病,更加斗争。草石相反,使人迷乱,力甚刀针。若调和得所,虽未能治病,犹得安利五脏,于病无所增剧。”甄权的《药性论》则对药物的君臣佐使颇为重视,该书对所收载的多数药物都注明了为君药或臣药等,计标明君药76味,臣药72味,使药108味(当然这一划定是片面的)。此外,对许多药物还注明了配伍宜忌。《蜀本草》进而对前人在本草中的药物七情畏恶资料进行整理和统计,作者韩保昇在《本经》序录中指出:“凡三百六十五种,单行者七十一种,相须者十二种,相使者九十种,相畏者七十八种,相恶者六十种,相反者十八种,相杀者三十六种。”这对于临床选择用药是很有帮助的。

3. 性味、毒性 随着用药历史的发展,对药物性味、毒性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和提高。兹举历代本草对若干药物的记述加以比较即可看出。如:雄黄,《本经》谓“苦,平,寒”,《别录》谓“甘,大温,有毒”,《药性论》则谓“味辛,有大毒”;桔梗,《本经》谓“辛,微温”,《别录》谓“苦,有小毒”,《药性论》则谓“苦,平,无毒”;大戟,《本经》谓“苦,寒”,《别录》谓“甘,大寒,有小毒”,《药性论》则谓“苦,辛,有大毒”。又如防己,《本经》谓“辛,平”,《别录》谓“苦,温”,《药性论》则具体区分了汉防己“苦”,木防己“苦辛”,更为全面。另如燕麦,《别录》谓“甘,微寒”,陶弘景谓此“性乃热”,《新修本草》则指出:“燕麦性寒,陶云性热,非也……此皆江东少有,故斟酌言之。”枸杞子,《本经》列上品,《别录》称“微寒”,《药性论》则曰“甘,平”,说明唐代诸家本草对药性的审定较前人所说更切实际。

4. 功能、主治与特效药 隋唐时期本草对药物功能和主治仍未明确区分开来,有关功能均在“主治”中叙述,且大多缺乏功能的内容。然而有关记载更为审慎,大多能切合实际(见前述“主要本草”《药性论》一节)。

由于用药经验的不断积累,若干药物的特殊功用和疗效逐渐被确认,于是出现了若干特效药。如常山治疟(《本经》早有记载,晋代也较多用之,而唐代应用更为普遍。在《千金要方》治疟的23方中,用常山者有17首;《外台秘要》治疟的86首方中,有57首用常山,有的还是单味药。又如唐代医家已知久吃白米会引起脚气病,因而提出用糙米(如粳米)治疗;《千金要方》就说:“凡脚气之病……惟得食粳粟米。”再如利用动物脏器治疗疾病的脏器疗法,更是此期的重大发现。其间利用羊膻、鹿膻治瘵疾,利用羊肝、猪肝、兔肝等治青盲、雀目,利用胎盘补虚劳、调经血等,均多见于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医籍中。

(三) 食疗本草的建立

在唐代以前已有多种与“食疗”有关的书籍,但都不是“食疗本草”的专著。有关本草中记载的许多食物的功能、主治等内容,也未从一般本草中分化出来,独立成篇。直到唐代孙思邈才首次专门加以总结。他在《千金要方》中专设“食治篇”,以“序论”论述了食疗的重要意义和药、食异同。如引卫汎记说:“安身之本,必资于食,救疾之速,必凭于药,不知食宜者,不足以存生也;不明药忌者,不能以除病也。”又说:“食能排邪而安脏腑,悦神爽志以资血气,若能食平调,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……夫为医者,当须先洞晓病源,知其所犯,以食治之。食疗不愈,然后命药。”接着按果实、蔬菜、谷米、鸟兽(附虫鱼)四大部分叙述了162种食物的性能、应用等,对食物的作用和食、药的特点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孟诜《食疗本草》的问世,从内容到名称上清楚地显示了食物类本草的建立,促进了此后食疗本草及中医食疗的发展。

三、主要本草学家

隋唐经济文化发达,医药兴旺,出现了诸如苏敬、陈藏器、甄权、孟诜、李珣等一批著名本草学家,他们同时也是本草学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,其中影响久远、文献记载较多者有:

(一) 苏敬

7世纪唐代湖北人,史书无传,生卒年代不详。曾任右监门府长史等官职。本为儒臣,兼通医药。显庆二年(657年),苏敬“揣陶氏之乖违,辨俗用之纰紊”(《新修本草》孔志约序),向唐政府提出修本草建议。朝廷即指派当时掌权的长孙无忌、李勣(李世勣)等领衔,由名医儒臣们着手编修,而实际上由苏敬负主要责任,至显庆四年(659年)全书编纂完毕。此外,苏敬还与徐思恭、唐临合著有《三家脚气论》,后亡佚,但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医心方》中均引有苏敬论脚气的条文。